

西安事變親歷記

李金洲 著

一、前言

西安事變，爲中國現代史上一重大事件，關係國家命運至深且鉅，加速日本軍閥之侵略，在我八年抗日戰爭中，使共匪乘機坐大。接近勝利邊緣，又被盟國雅爾達會議所出賣，由蘇聯出兵東北，阻礙我國接收，除將主要工業設備，劫奪一空，所有東北日軍武器，及大部僞軍，全部移交共匪，使匪方實力驟然增加數十百倍，致成燎原之勢，而不可收拾。東北撤守，又因傳作義之認賊作父，李宗仁之盲目求和，以致大陸全部淪陷，政府偏安海隅，使七億同胞陷於水深火熱之中。推源禍始，皆肇端於西安事變。時本人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秘書，兼辦公廳第六科科长，主管情報，及發佈新聞。事變前，曾被派兩度赴晉，謁閻錫山主任探詢對剿匪意見。事變後，又以張

楊代表身份，飛往太原，與閻商談解決時局危機辦法。爲當時來自西安向外界透露事變真象之第一人。及副司令護送委座回京，作者亦爲少數隨員之一。在京被扣月餘，何應欽部長爲釋放被扣西安之戰鬥機三十六架，派作者乘專機飛返西安持函晤楊虎城。此爲民航機之第一次試航，幾經波折，始到達目的地。繼而西安內鬩，王以哲等被害，作者險遭不測，後再搭第一次試航之民航機返京覆命。對事變之前因後果，細微末節，皆親身經歷。緬懷往事，眞令人有不堪回首之感。關於事變記載，「傳記文學」及其他報刊已刊登甚多，但多係局外人揣測之作，理論多，而事實少，且眞實在經過頗有出入。從無親身經歷詳悉內容之人，作一詳細之報導，以供歷史上之參考。朋友中皆以作者親預其事，知之最稔，對此工作，責無旁貸。徒以國破家亡，流亡海外，痛定思痛，艱於執筆，或亦爲環境所不許也。卅五年來守口如瓶，從無隻字發表，蓋因此一事變，原因複雜，歸罪於張副司令一人之身，有欠公允，現已時過境遷，有關人氏，或已作古，或已退休，政治上之恩怨，已成過去，本人不能再事緘默，對將來歷史上，必須有個交代。所述內容，皆作者親身經歷或親眼目觀，百分之百

爲事實，均爲廿三、廿四、廿五年中之記載，但月日因無參考資料，容有記憶不清。至文內有干礙他人之處，尙乞以爲歷史作證之勇氣，予以原諒是幸。

二、西安事變之遠因

民國廿三年春，張學良氏自國外歸來，精神體魄，前後判若兩人，體重將近兩百磅，精神充沛，（作者初次晤張氏，爲廿年渠就任北平市黨部委員典禮中，當時其卅初度而健康情形壞到極點，體重不會超過一百廿磅，瘦弱不堪，致辭時有氣無力，在臺下觀禮者，僅能看到兩隻眼睛，一撮小鬍子，而無法看清面部。）在思想方面，受德義兩國，擁護領袖，團結奮鬥，轉弱爲強之影響，一反昔日之萎靡不振而爲發奮圖強勇氣百倍之堅強鬥士。旋被任爲豫鄂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（總司令爲委座自兼），駐節武昌，其舊部除于學忠、萬福麟、繆激流、孫德荃、黃顯聲等部仍駐華北外，幾全部南調，圍剿豫鄂皖邊區共匪。張氏曾數度親往前線指揮，一方面爲了解前方佈署，敵我情況，一方面爲視察舊部官兵，鼓勵士氣。當時公路並不普遍，多半爲在田間小徑

步行，張氏健步如飛，文職隨員恐怕落伍，勉強在後追隨，苦不堪言。時當盛暑，湖北酷熱，走得大家汗出如漿，軍服濕透，對部隊訓話時，無暇更換，張氏每在外另加一件乾的而不以為苦。武昌總部，設在望山門內舊兩湖總督衙門，官邸在武勝門外徐家棚粵漢鐵路官舍，由徐家棚沿江至文昌門，有馬路可通汽車，為張氏每日上下班必經之路，需時半小時至四十分鐘，張氏利用往返時間，特邀參謀秘書數人，輪流住在官邸，每日隨車研討與軍事政治經濟有關問題，或閱讀書報，從無間斷。（在臺曾任經濟部次長之王撫洲氏，即為其中之一員。）午間僅在辦公室吃三明治飲紅茶，聊充午餐，其刻苦自礪，與自強不息之精神可見一斑。且為擁護領袖精誠團結起見，發起組織四維學會，邀委座重要幹部，及其本人左右人員參加為會員，希望能在思想上可交換意見，在精神上可打成一片。是時張氏對委座除部屬關係外，事之如父執，委座亦視之如子弟，愛護備至。因此當時有人對張甚為忌妒，因張氏青年有為，前途似錦，既雄於財，又握重兵，自東北易幟後，由東北邊防司令長官，而陸海空軍副總司令，而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，所謂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未免眼紅。而張氏少年氣盛

，鋒芒畢露，難免或有開罪於人之處，且自備新式飛機往來京滬，更不免令人側目。幸而總部參謀長錢大鈞氏資高望重，又深識大體，稟承委座意旨，輔佐張氏，公誼私交，可謂水乳交融，合作無間，許多問題，都由他從中無形化解，從未發生歧見。而上述情勢，仍在繼續滋長之中，未能澈底消弭也。

三、更換幕僚長種下禍根

民國廿四年十一月，中央召開第五次全大會，張、錢兩氏皆赴京出席，同住首都飯店，其他隨員，均住中央飯店（作者本人在內）。時共匪已竄往陝北，東北軍奉令調往西北，會同友軍繼續清剿。爲統一指揮，組織西北剿匪總司令部，仍由委座兼總司令，張氏爲副總司令，部隊已陸續開往陝甘一帶，武昌總部已遷往西安，改組西北總部。張氏會畢，即迺返西安，指揮軍事，惟錢氏仍遲遲其行。同仁等不明真相，在離京前赴首都飯店晉謁，並詢其何時離京，他說：「你們還不知道嗎！我已經被撤差了！」大家一時莫名其妙，認爲他在說笑話，他繼續說道：「他們都說我投降副司令

了！」言下不勝感慨。由此可見中樞方面，仍有人對張氏之擁護領袖，有所歧視。後不久發表錢氏爲侍從室第一處主任，說撤差是笑話。而所謂「投降副司令」一語可能於無意中流露出來。西北總部成立，改派晏道剛氏（湖北人曾任侍從室主任）任參謀長，吳家象爲秘書長，辦公廳主任爲米春霖，參謀處長徐方，軍需處長閔湘帆（事發後調任軍政部會計長），軍法處長爲趙翰九，黨政處長周達夫，副處長爲王撫洲兄（不久，周氏調任甘肅省政府秘書長，由王撫洲兄升代。）。晏氏就職後，恐怕人說他投降副司令，乃一反錢氏態度，處處吹毛求疵，專挑東北軍的毛病，甚至及於副司令本人（是否有人授意則不得而知）。且在主持紀念週時，公開批評副司令，似此情形，渠已變輔佐主官之任務，而變爲帝制時代之監軍。副司令還算有涵養，一再容忍。而總部同仁，東北軍將領，對之情緒日益惡劣，而西安事變之禍根，即潛伏於此。後張氏送委座回京，西安蒙難人員在委座官邸拍照留念時，晏氏亦前往參加，被委座當面嚴厲申斥，令其退出，以後永未敘用，可爲佐證。在此有一插曲，事涉迷信，而事後果驗。當張氏在京開會時，西北剿匪副司令之任命已經發表，渠偶有上海之行，料

理滬寓私事，少數隨員亦隨同前往。當時駐滬辦事的，爲前張氏之副官處長湯國楨氏，在其寓所招待同仁，饗以其夫人親釀之玫瑰露（以鮮玫瑰花浸白酒中而成），色香味俱佳，頗爲同仁所欣賞，進餐時，湯氏說張氏調往西北事皆前定，在李淳風與袁天綱之推背圖上已有記載，原文爲「西北將軍會八牛」請大家想想當如何解釋，（作者從未看過推背圖，確不敢負責，姑妄聽之而已。）在座同仁，均茫然不解。後黎天才兄謂副司令八字屬牛，渠亦屬牛，或在張氏左右將領中，尚有六個屬牛的，亦未可知。當時不過酒後笑談，及西安事變後，方悟八牛者朱也，朱者赤也，張氏發動事變，促成政府與赤匪合作也。冥冥中其有數乎？

四、左傾份子包圍副司令左右

東北同胞個性，重感情講義氣，但有時過於衝動（當然也有例外），爲衆所週知之事實。在上文所述環境中，同仁中激於義忿，自然難免在副司令前發洩不滿情緒。木必先腐，而後蟲生，左傾份子，進而包圍副座左右。主要份子爲高崇民、苗劍秋、

應德田、栗又文、孫銘久諸人。高崇民氏並無高深學歷，而自命不凡，深得「見大人而貌之」妙訣，其資歷僅爲一交涉署科長，但無論見誰，都是「吊而郎當」（引本刊劉健羣先生述高氏晉見委座語），高談闊論，旁若無人。其夫人吸食鴉片，作者曾親見其陪夫人一榻橫陳，吞雲吐霧，其本人是否同好，因未親睹，不敢肯定。後其夫人不悉何故，在西安服大量安眠藥自殺，此後與一年二十左右之青年女子同居，事後方知此人爲共黨工作人員，其夫人是否因此自盡，則不得而知。大陸淪陷，高氏任偽東北人民政府副主席，爲高崗之副手，自高岡被清算後，即未見其消息。苗劍秋爲留日學生，與高某爲一流人物，綽號苗瘋子，專唱反調，任何人都罵。上述兩人皆張氏之清客，在總部並無名義。應德田爲東北大學學生，而後留英深造，任總部中校秘書。此人面有反骨，性情陰鷲，與秘書室同仁，甚少往還。栗又文氏學歷不詳，在東北曾任中學校長，爲張氏私人秘書，從未在總部露面。此人亦爲共產黨，東北淪陷後，曾任共匪遼北省主席。孫銘久，爲日本士官學生，爲張氏二弟天津市長張學銘之同學，曾在天津警察局服務，張學銘去職後，任張氏之侍從參謀，爲上述集團中之惟一軍人。

，其後任衛隊營長，繼升衛隊團長，兼西安軍警督察處長，皆爲左傾份子，有計劃的培植武裝勢力，包圍張氏左右。此人精明強幹，甚得副司令信任，但並非共產黨分子，不過不知不覺中作了共黨份子的工具而已。併邀有其他東北青年左傾份子，住在張氏官邸，秘密工作，但從未公開露面。作者僅識其中一人，名解如川，爲孫銘久士官之同學，亦曾在天津警察局任特務隊長，當時作者任北平市警察局司法科長兼特務科長，因公事上曾有往還。事變前從未謀面，事變後曾搭作者專機飛往太原，轉往廣西，充張氏代表。因其與廣西之劉斐爲同學，並有私交，劉斐在抗戰時期任軍令部次長，爲共產黨潛伏國軍最高指揮部之頭號間諜，大陸陷匪後，曾以共黨開國功臣爲毛匪之上賓。解某亦爲共黨之重要腳色，韓戰停戰談判在板門店開會時，曾充中共代表。上述份子在副司令左右，宣傳反對剿匪理論，認東北軍擔任剿匪工作，爲中央之一石二鳥政策，消滅共黨後，東北軍亦將同歸於盡，幾十萬東北子弟，追隨副司令，爲的是打回東北去，如此犧牲，真是死不瞑目。共產黨的宣傳方法就是「假話只管說，說多了變成了真話。」何況因當時張氏情緒不佳，他們更言之成理，並添枝添葉造些似

是而非之謠言，時日既久，任何人都難免動搖。在歷史上許多英明之主，被宵小包圍，危及國本者，不乏先例，所謂君子可欺之以其方也。

五、剿匪失利、兩師長殉職、部隊番號被撤銷

在廿五年春軍事佈署完成，對共匪即開始進剿。一開始進展頗為順利，因前進過速，致遭共匪之包圍，陸軍第一〇九師及第一一〇師，幾乎全軍盡墨，師長何立中、牛元峰壯烈殉職。勝敗本兵家常事，在江西剿匪時，多少部隊全軍覆沒，多少軍師長陣亡。且在陝北作戰，既無砲兵掩護，又無空軍協助，對付匪之以大吃小，包圍打援之游擊戰術，行動颯忽，鬼計多端，僅五六團步兵，又無重武器，作戰失敗，原無足驚異，而此一戰役，所引起影響之重大，有出乎意料之外者。茲先將東北軍之編制略述如下：自張氏就任陸海空軍副司令後，所統率部隊全部改編，空軍海軍全部移交中央，砲兵因中央缺乏砲兵，亦全部調往河南湖北一帶剿匪，中央統一指揮，僅留一山砲兵團，團長為劉佩偉。于學忠為五十一軍軍長，萬福麟為五十三軍軍長，董英斌為

五十七軍軍長，王以哲爲六十七軍軍長，何柱國爲騎兵軍軍長，師的編制除第一〇五師（張氏衛隊改編），爲三三制，即三旅，每旅三團，尙配屬有高砲大隊，通信大隊等，實力超過兩個軍以上，師長由張氏自兼，劉多荃爲副師長。第一〇六師師長沈克，爲收編石友三舊部，編制較大，其餘皆東北軍之旅改編，僅旅長改爲師長，仍爲步兵三團，是故一〇九、一一〇兩師不過六團人而已。事後由總部呈請中央補充武器彈藥，以便對該兩師東行整理訓練。（東北軍從未向中央請求補充，所需武器彈藥，皆係在東北舊存之物，此爲第一次申請。）對兩師長忠勇殉職功在國家，擬請予特卹，每人家屬各十萬元；所得反應，是特卹碍難照准，兩師番號予以撤銷，勿庸補充。張氏對此極爲不滿，曾不勝感慨的說：「我張某人混的不值十萬塊錢了。」而反觀共匪方面，對被俘官兵，極爲優待，利用官兵思鄉心理，宣傳「中央不抗日，專門剷除異己，調東北軍剿匪，是使兩敗俱傷，同歸於盡。你們永遠不能打回老家去。」極盡其煽惑之能事，並稱「共產黨對東北軍處境極爲同情，如能聯合一致對外，北上抗日，收復東北，是東北軍之唯一出路。」此後東北軍如不進攻，共軍決不侵犯。」官兵

被洗腦後陸續放還，這一批人在軍中成了共匪義務宣傳員，其中有第一〇七師團長高福源，且變成共匪代言人，盡情向軍長王以哲反映。王又據此向張氏報告。上述兩事，互相對照，證實了左傾份子之理論果然應驗，所謂一石二鳥政策，得到事實證明。從此張氏對中央之安內攘外政策，有所懷疑，對剿匪工作一變積極而為消極，無形中與共匪成立了互不侵犯協定。

六、奉派兩度赴晉探詢閻主任百川對剿匪態度

張氏對剿匪發生懷疑，態度仍在游移未決之中，為明瞭素以老謀深算之閻百川氏對剿匪意見，秘令作者以私人身份前往太原一行，便中與閻氏一談。因作者於民國十七年隨戰地政務委員會到達平津，閻時任平津衛戍總司令，曾在其屬下工作，後又被邀赴晉工作兩年，與閻氏為素識也。當時有第二第三兩集團軍爭奪平津地盤之一幕，外間知者不多，附記於此。北伐末期，平津為閻馮克復，實際上為東北軍之和平移交。天津方面東北軍移交閻系將領傅作義（任天津警備司令），初傅氏於守涿州時，因

被東北軍圍困，以彈盡援絕，和平解決，亦即變像的投降，部隊交東北軍改編，予傅氏以閒散名義，隱居天津，因此不勞而獲，頗爲馮部所側目。北平方面，閻馮兩軍同時到達，馮系韓復榘部抵南苑，閻系張蔭梧部到達西苑，東北軍素惡馮，而與閻友善，乃拒韓部於永定門，而啓西直門以納閻軍。留守北平維持治安之鮑毓麟旅，本由外交團及地方士紳挽留，並與閻馮商妥，保證其安全撤回東北，至此韓復榘一怒將鮑旅在東郊包圍繳械，鮑氏僅以身免。後鮑氏於十九年得任北平公安局長，即種因於此。及蔣總司令到平，爲協調雙方，任命馮系之何其鞏爲北平市長，而任閻氏之趙以寬爲公安局長，平分春色。作者與政委會同仁廿餘人，被派往公安局擔任政訓工作，被任爲政治訓練部宣傳科長，後兼本局司法科長。至廿一年閻氏由大連返國，出任太原綏靖主任，爲整頓山西警政，被邀至太原任省會公安局秘書長。閻氏事必躬親，爲研究改進警政，每週在綏署舉行會報一次，公安局由局長王錫符氏及本人出席，綏署閻氏指定梁秘書敦厚（爲閻氏之甥，即太原五百完人之代山西主席梁化之）主持，閻氏本人、趙戴文氏、賈景德氏，亦有時親臨指導，因此作者與山西上級軍政人員多爲素識。

也。作者到太原後先謁趙戴文氏，據稱閻主任時以剿匪非計爲念，理由爲對內則將來無以對外也。繼由趙氏陪同晉謁閻氏，所談亦同，並稱有機會將與張氏聯合向委座進言，囑作者轉陳張氏。返陝後在王曲軍官訓練團向張氏報告閻氏對剿匪意見，張氏以英雄所見略同，頗有喜色。同時作者爲針對西安危機，附帶提出兩點，向張氏報告：（一）太原有不少左傾份子，如侯外廬（後任中共政權之西北大學校長）、周北峰（山西大學教授，後於平津危急時，在通州與鄧寶珊代表傅作義與中共簽投降協定者）、續範亭（曾任鄧寶珊之參謀長，戰前在南京演哭陵怪劇，在總理陵前剖腹自殺未死者），生活雖由閻氏照顧，但在綏署皆無名義，僅有時備閻氏之諮詢而已，絕不能左右閻氏之思想。此點意在提醒張氏，無令左傾份子潛伏左右。（二）閻氏雖不主張繼續剿匪，但絕對擁護中央，並無反對蔣委員長之意，張氏聞言頗有不悅之色，說：「你是說我反蔣嗎？」我解釋說，副司令既派我探詢閻氏態度，我不得不向鈞座忠實報告，不能少有保留。張氏面色少霽，續稱「咱們也不反對蔣先生。」因此一語作者在事變後東北軍內閔時，幾遭殺身之禍。當年秋，張氏電召前任陸海空軍副司令部參謀長戢翼翹

先生（字勣成，湖北人，曾任東北軍軍長多年）前來西安，命本人陪同戡氏再度前往太原與閻主任懇談，或因作者人微言輕，不足徵信，爲慎重計，特召其已退休之老參謀長再與閻先生一談，以昭慎重，因戡氏與閻及其參謀長朱綬光（湖北人，爲現任駐巴西大使朱撫松之伯父）爲日本士官學校之同期同學。在中原大戰後，閻氏避地大連，所有華北諸省均係張副司令轄區，山西善後，中央亦交張氏全權處理，當時曾有人建議調東北軍一軍進駐太原，因綏遠主席傅作義爲東北降將，東山再起，全靠東北軍支持，始由天津警備司令，而得任綏遠主席，察哈爾主席爲東北軍人劉翼飛氏，如此則晉冀察綏四省地盤，可穩如磐石。張氏爲人向來恢宏大量，絕不趕盡殺絕，未予採納，並謂：「閻氏老成謀國，一旦有事，國家還要借重他的。」閻氏此後之能捲土重來，實由張氏之大度寬容。時戡氏任參謀長，頗支持張氏主張，因此閻氏對戡不無感激之意，赴晉任務戡氏確爲適當人選。爲避免消息外洩，作者陪同戡氏由潼關渡河，循同蒲路赴太原，該路草創，設備簡陋，僅有三等客車，飲食亦極不便，費一整日之時間，始達太原。戡氏以望六之年，頗感疲勞，甚以爲苦。在太原盤桓數日，酬酢甚

忙，由本人陪同與閻先生長談兩次，內容與前完全相同。歸程戡先生以年老不慣奔波，乃改由太原赴石家莊，在正太飯店停留一日，草擬致副司令報告，交作者帶回西安轉呈，渠本人逕返北平寓所。張氏閱戡氏報告後，對停止剿匪，一致對外之信念，益趨堅定，表示只候得有機會，再與閻先生聯合向委員長建議，足證張氏仍擁護領袖與國家統一，初衷未少變更，未料到後來竟演成事變也。

在此附帶一談傅作義之爲人。傅氏爲保定軍官學校五期生，與山西將領多爲同期同學，爲人圓通，八面玲瓏。閻左右將領多爲晉北五臺崞縣人，傅籍隸晉南，頗受岐視，但以善於應付，竟能出人頭地，得任綏遠主席。雖練兵作事頗有長處，但遇事無當機立斷之精神，更乏堅忍不拔之意志，守涿州有始無終，反得東北軍支持，坐享其成，得任天津警備司令，繼而綏遠主席，更堅定其遇事遂其自然，適應環境之信念。當平津危急之際，先決定必要時放棄北平，堅守天津，並將軍眷悉數送往天津，不得已由海路南撤，原爲最正確之戰略。當時作者任職於天津市政府，主管財政，在市政會議上市長杜建時曾令警察局代覓民房安置華北總部軍眷，故知之甚詳。到時局日趨